

华北解放区 财经记事

赵秀山 冯田夫 赵军威 编撰

中国档案出版社

华北解放区财经记事

王西乾

赵秀山 冯田夫 赵军威 编撰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 / 郭年

封面设计 / 新新版艺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 / 赵秀山,冯田夫,赵军威编.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8

ISBN 7-80166-202-4

I.华... II.①赵...②冯...③赵... III.解放区—经济史—大事记—华北地区 IV.F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273 号

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HUABEI JIEFANGQU CAIJING JISHI)

出版 / 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西城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 / 本社发行

印刷 / 廊坊市光达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1/32 印张 / 20 字数 492 千字

版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85.00 元

编写说明

本书采取纪事体裁,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各个领域的重要工作、重要事件、重要会议以及重要法规的制定过程。全书分为三部分:一、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综述;二、华北解放区财经大事记述;三、华北解放区财经要事备考。内容从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梗概到具体记述再到要事列举,使读者对华北解放区的财经事业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了解。

本书以赵秀山、星光、王同兴、冯田夫编辑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为基础,吸取了近期史学界有关研究成果、查阅了华北解放区几个地区的革命史书以及其他档案、文献报刊等史料而编写的。本书第一部分由赵秀山、赵军威撰稿;第二部分由冯田夫编撰,赵秀山补充、订正;第三部分由赵秀山、赵军威编写(或摘编)。全书由赵秀山总纂。因编著者档案不齐和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予以补正。

本书的编写工作,始终得到戎子和、宋劭文、周文龙、许毅等老领导的关心和指导。王丙乾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许毅同志为本书作序。在本书出版时,特向宋老、戎老致哀,向周老、王老、许老致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赵秀山 冯田夫

2001年12月1日

序 言

许 毅

一、研究的过程和问题的提出

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是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完成这项研究任务,在中央有关部门和财政部党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普遍地开展了一次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的编辑整理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今日为之作序的《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既是这次活动的项目之一,又是这次活动的收尾成果,它的出版,标志着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编辑整理工作的全面完成。此时,有必要首先利用这个机会,把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研究的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基本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财经理论界提出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规律,认识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为此,系统地整理研究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财经理论与实践、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借鉴的任务就摆在财经理论界和财经实际工作者面前。

那时,许涤新同志正在从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齐燕铭同志从事革命根据地财经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我

多年思考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于是,在齐燕铭同志和当时的财政部长张劲夫同志的指导下,由我牵头,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为主,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杭州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学院以及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委党校、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江西师范学院、江西中医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赣南地委党校、江西省财政厅等等单位的一些专家学者,共同发掘整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等地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料,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由此为始,全面铺开了这项研究课题。在编写《长编》过程中,齐燕铭同志调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由于他工作繁重,过度操劳,不幸病逝,未能看到《长编》的正式出版,也不能再领导这项研究工作。这样,完成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整理和财经史研究的全部工作,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身上。

编撰《长编》是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整理工作的开端。在编撰《长编》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济史研究的队伍,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先后出版了多种的、不同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史料。华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最后一站,也是为建立新中国而奠定的最后一块基石,因而《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也就成为这一系列研究的最后一项。

在研究根据地财政经济的过程中,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如何在乡村发展壮大,建立红色政权,进而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如何解决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何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来支持革命的需要?以及如何用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落后的小农思想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形成所必须回答的。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后,上述问题都可以从土地

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中看到端倪。这就是下功夫专心致志研究整理编撰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的原因。

研究根据地的财经,必然要联系到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及其性质,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府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政权,他们的性质和使命都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改变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实现了由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的胜利道路,但是落后的农村小生产是无法直接进入以工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主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没收的那部分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的生产资料。

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生产力从哪里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的老领导黄逸峰同志当时负责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他和姜铎同志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发生发展状况,尤其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洋务运动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然而我在研究外债问题时发现,外债恰恰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由此而从外债着手,作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切入点,联系清代的洋务运动和外债的关系,进而着手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研究根据地财政经济,是为了说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依靠落后的农村,打败蒋介石的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专制政权。由农村进入城市不表明直接转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之

上。所以我们必须研究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哪里来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而研究外债就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化的生产力是由哪里来的,也就是说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论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识和回答的问题。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通过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财经建设、军事斗争等问题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据此,我们回答与革命根据地有关的问题乃至对整个历史进行分析研究就有了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由于中国革命的后发特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最初主要在城市和工人中间开展革命宣传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斗争,反帝反封、打倒封建军阀是党的最低纲领,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进入低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一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尤其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参与,孙中山确立了“新三民主义”,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打倒了封建复辟的北洋军阀政权,真正完成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

这一伟大的胜利,无疑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初步确立,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政权也为资产阶级上层代表所掌握。此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参与领导和积极推动,在革命的性质上,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阶级的联合,阶级的分裂,是时而联合,时而分裂的,这个矛盾的转化,要分析条件。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一个共同敌人面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才是当时的共同利益所在。正如恩格斯曾讲过的:“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①这就说明分和合,时而分,时而合,都是随着矛盾的转化而转变的,这是历史的规律。因此,当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之后,因为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同,国共之间便动起手来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加上共产国际指导上也有错误,致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坚强的中国共产党人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广州起义,到处响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枪声。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悬殊,在城市开展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下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页。

毛泽东当时已经有了武装农民的思想,他在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攻打长沙遭到严重挫折后,果断决定将有限的革命力量转入乡村,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②。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通过深入调查和科学地研究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总结了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在国共共同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经过“四一二”政变和“宁汉合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开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采取了对立和镇压的政策,尤其对于广大农村存在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没有任何触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规定了党在这一时期进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战略任务,就是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要实现这个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血与火的洗礼,认识到必须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通过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战略。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遭受过巨大困难,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者,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3 页。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革命具有长期性、阶段性这两个基本特点,在理论和实践上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国情,正确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旧中国广大农民在官僚、买办和豪绅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封建的、反动的生产关系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

土地革命就是要求打碎封建枷锁的农民同顽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地主阶级和支持封建势力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殊死战争。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不只是赶跑皇帝,打倒了封建军阀,它最终的任务是要摧毁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发展生产力扫清道路。在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战争胜利了,土地革命才能进行;土地革命胜利了,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生产力才能获得解放,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才能恢复和发展。在这里,生产关系的变革起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党的中心任务,而要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不发展农村生产力,革命根据地就无法巩固,革命战争的物质供给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十分疲惫,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就无法实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大任务必须结合起来,才能使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正确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是无法真正理解的,因此他们以极大的盲目性把革命战争置于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力所不能及的基础之上,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

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中心任务。我们所说的革命主要是指所有制的革命,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不仅限于所有制,还有分配关系的变革,交换关系的变革以及劳动中人与人关系的变革,这些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这些方面的变革内容十分丰富,它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决不能轻视。

这样,我们在回顾中国革命发展中的进程中,就可能比较清醒地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全面、正确地把握和认识中国的特色。

应该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中国的特色,既需要水平,又需要勇气。在这种客观学术背景下,从根据地入手,了解、领会财经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服务,为工人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反封建服务,调动农民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性,进一步提高小农经济的积极性和客观条件下的使农民阶级实现由自为到自在的变革,从实质上体现着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思想,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研究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指出,上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而且必然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我们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为纲要来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冲突的必然结果。这场革命的动力也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仍然是由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规定的。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包含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不可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的,而只能以工人阶级

为领导、与广大的农民结成最巩固的同盟军,在推翻官僚、买办和豪绅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治统治以后,利用工农民主专政自觉地建立起来。作为上层建筑的工农民主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确立,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是从土地革命起,以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型的农村民主政权开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摧毁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建立,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诞生,乃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依靠的是枪杆子的力量和政权的力量。在这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过对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研究,我们力求用史实来说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历史经验,特别重要的是探讨作为经济杠杆的财政金融,是怎样配合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怎样体现国家职能的作用,为创造新型经济关系服务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① 列宁也指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的支持下才会产生。因此,我们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进一步认识财政金融的这种作用,从中寻找规律性的东西,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演变问题,论证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国家分配的本质。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

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导思想,它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在基本种意义上,它体现着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雏形的革命根据地的“国家职能”。“保障供给”实质上讲的是保障党、政、军、民、学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保障发展生产力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物质生活要求为总目标的需要。在这一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想中,发展生产是基础和前提。把它单纯理解为发展生产力低下的根据地的农村经济和公营经济,或者简单、狭义地理解保障供给只是保障军队的供给,即所谓“人吃马喂”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才是财政的职能,也就是国家的职能。

三、华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如何认识根据地,如何认识党的方针路线是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基础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先进分子,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三大法宝——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从而完整表述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同时在实践上取得胜利。研究根据地财经历史,就是要从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实践出发,全面认识财经如何为根据地的发展、建设服务,认识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势力,改变农村生产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政治积极性,使之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由革命的同盟军变为主力军。体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以及由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

从1978年以来,我们全面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转变,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经验。具体到根据地财经史料的编撰,我直接参与和领导了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以期全面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三个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

任务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与发展。

在中央苏区的斗争和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她代表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在大资产阶级势力在城市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完成资产阶级未能承担的任务,改变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党人又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整革命对象、策略和任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深入了解中国国情,适时转变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以华北解放区为中心、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作为中国革命的战士和根据地财经战线老兵,我愿意把自己在总结根据地历史过程中的认识和体会,结合华北解放区的财经实践提供给大家。

一、华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处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代表和实践着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依靠农民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条件下,适时调整党的中心工作和任务,把革命的战略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结合东北解放区的经验和占领济南、石家庄等大城市后面临的问题,从接收城市到管理城市,制订、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恢复城市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实践了党的战备部署。

三、华北解放区作为新中国的雏形,在组织和人事方面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保证。华北解放区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

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
基础,开始领导全国的财政工作。

四、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解放区的财
经工作有利地配合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从组织农村发展
生产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以及实行有效的公债政策、
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建立统一的农村市场,保障了前线的军事胜
利和后方的生产发展。

五、为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改变农村中的封建土
地所有制,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解决了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调动了广
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六、在人民革命战争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为了配合经济战线
的工作任务,有效地组织了解放区的资源,为在经济战线打败资产
阶级的反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统一了全国市场,遏制了连续
多年的通货膨胀。取得了经济战线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胜利。

从编辑《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抗日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到《华北解放财经纪事》,20多年来,
我们先后完成了陕甘宁、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
西、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东北、中原以及东
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
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
了财经史。各地先后出版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31种,
共4000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所有这些成果,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根据地财经打下了基础。

我是这一系列工程的主持的人。在戎子和、张劲夫、吴波、王
丙乾、陈如龙等同志的指导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
编》完成后,又经过统一组织和安排,迅速形成了以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和中国财政学会为中心,由各地财政部门配合,有财政系

统的科研人员、在职和离休干部和少数高等院校(如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宏大队伍,先后参加这项工程的总计有几百人,召开会议几十次。全国财税系统为此提供了全面周到的服务,中央和有关省市的档案部门、文化出版单位也全力配合、支持,使这项工作进行的相当顺利。

我对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研究有着很深的感情。当这个工程的最后一项成果完成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在此,我向一直倡导、支持、关心这一工作的老领导张劲夫、吴波、周文龙等同志致敬;向永远离开我们的老领导齐燕铭、宋劭文、戎子和等同志致哀;向各省市财税部门的有关同志和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致谢。戎子和同志在华北财经史的研究过程中,倾注了很大的心血,直到他以九十三岁高龄仙逝前,还嘱咐赵秀山、冯田夫同志,一定要把华北财经史这项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这部书的出版,也是对戎老英灵的告慰。

多年以来,大部分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和根据地财经史的编撰,一直由赵秀山、星光和冯田夫同志具体组织实施,《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也是由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不避繁难,表现出了财政老兵和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在此,我也向他们表示祝贺。